

金芒果新批评文丛

孙荪 王鸿生 主编

流浪的诗学

郎毛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亚亡未新机译文丛

流浪的诗学

郎毛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浪的诗学/郎毛 著 . -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5

(金芒果新批评文丛/孙苏 王鸿生 主编)

ISBN 7-80127-340-0

I . 流... II . 郎... III .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 1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212 号

流浪的诗学

著者	郎毛
责任编辑	刘加民
责任校对	徐建华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总字数	853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总印张	41.5 印张

ISBN 7-80127-340-0/G·155 全套 (6 册) 总定价: 10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金芒果新批评文丛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鸿生 孙 荏 刘思谦
张保振 陈维会 何向阳
武泉水 耿占春 鲁枢元

策划人

阎 婕 孙铁道 王运一

总序

90年代的文学批评，似乎越来越受制于市场和学院这两种体制化力量的互动关系，而不像80年代那样，其活力常来自自发的思想热情和文学兴趣。

对那些不在意文化生产特征而只注重知识转型的人们来说，今日之批评无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诸多数年前还令人惊诧莫名的新术语、新观念，如今早已泛化为职业人士乃至普通文科大学生手中的常识了。但并不使人感到乐观的地方在于，知识的进步并未使当代批评免于“过剩”与“匮乏”的双重困扰。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炒作”或无谓“争论”所造成的话语消费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则是批评对文学和文学生活的实际介入能力越来越显得萎缩。如果不是出于学位、职称、成果登记或学术权力等方面的强迫性考虑，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批评就将沦为一块无人愿意认领的荒地。

其中的原因并不难想象。我们的一些作家、读者和文化官员并不喜欢认真的批评，他们往往只需要适合自己胃口的东西。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场合，批评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就是不受欢迎的人。即使在文坛、学界，批评也未必被看作什么大本事、真学问，公开的或私下的奚落常常令批评家本人也自惭形秽。从经济学角度看，批评就更是一个投入、产

出与收益毫不成比例的行当，既然人都要生存，既然生存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任人选择，那么，谁乐意老是找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来干呢？就此而言，批评队伍的溃散和青黄不接，实在不是什么无法理解的事情。

常听到有人感叹中国缺少“大批评家”。此言固然不谬，但造就“大批评家”的土壤、环境和气候却不应落在视线之外。一位旅居海外的画家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某日，他在烈日下写生，一位途经这里的新西兰太太停足看他画画，不大一会儿，又用手中的报纸叠了个帽子，轻轻戴在他头上，然后悄然离去；走了没几步，回头一看，风把帽子吹掉了，老太太又折回身拣起帽子，重新给他戴上，并用力按紧，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画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他眼里都有湿润的东西在闪光，我们都知道，一种热爱艺术的民族传统和社会氛围，对艺术和艺术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未来世纪里，“大批评家”的诞生，乃至中国文化的复兴，难道不应该从这样一顶“纸帽子”开始吗？

其实，以中原之大、中国之大，并不乏不计名利、特立独行的批评新人，缺少的只是对他们的发现、理解与推重。孙荪先生和我之所以立意选编这套丛书，首先是为了表达一种歉意，因为，作为兄长、同道者或身边的朋友，在他们寂寥燃烧的漫长日子里，我们应该做而没有能够做的事情太多。其次，我们当然希望，这套丛书暨首编的六本批评文集，对人类人文精神之薪火的承传和宏大，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特别需要感谢河南省金芒果集团，在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的世风中，他们慨然向处境艰难的文学批评伸出了援

手。在我的感受中，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赞助，而是一种温暖的鞭策，其中包含着对精神探索价值的实实在在的肯定。同时，这套文丛的问世也有赖于经济日报出版社的具体努力，我们深知，并不是所有出版社都具备这种眼光和气度的。

愿文丛有益于读者心智，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一切或如荷尔德林所咏：“在此缺失的，自有一位上帝在彼处弥补”。

王鸿生

2000年6月16日

自 首

(代自序)

批评好像从来就是职业枪手的事情。或者是大学里的教授，他们讲文学史，讲潮流或者流派，讲动态，这样批评起来自然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而且还博大精深，来龙去脉一应俱全；要不就是研究所或者联合会里拿专门薪水的研究员们，他们拿了薪水就是专干这活儿的；当然纵横驰骋，老谋深算，艺高人胆大，无人能望其项背。说直了吧，他们是这个圈儿里的顶尖级人物。

惟独那些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游走的闲人，偶尔技痒，写些不伦不类的尴尬文章，发表在不三不四不出名的小报小刊上，或者索性一把锁封在抽屉里，像是命中注定不能登大雅之堂，或者叫狗肉上不了台面，或者叫游击队永远不为正规军所收编，民办教师没等熬上转正就已告老还农等等……

于是有了“准批评”的说法，这真是躲避奚落的一个妙法。你打不着我，也骂不着我，我早就谦卑而且惶恐了。

目 录

总 序.....	王鸿生 (1)
自首 (代自序)	(4)
§ 关于诗人之死的三重判断.....	(1)
§ 论诗歌言语运动的两个变项.....	(7)
§ 超情感初论.....	(30)
§ 超情感与不可传达之物.....	(37)
§ 瞧, 这个好像是诗的东西.....	(42)
§ 诗性言语.....	(45)
§ 诗的状态.....	(47)
§ 诗人之书会不会畅销.....	(51)
§ 空谈.....	(55)
§ 个别, 个体, 个体因.....	(57)
§ 河与堤.....	(58)

§ 意义的抵消.....	(59)
§ 存在客观主义如是说.....	(64)
附：存在客观主义诗歌第一号公告.....	(87)
§ 一个无关文化的经验事实.....	(90)
§ 剥夺联想.....	(91)
§ 再论比喻.....	(93)
§ 原型·EO·悟	(94)
附：王鸿生致郎毛.....	(98)
杨黎致郎毛.....	(99)
张进华致熊也	(101)
§ 20世纪和21世纪	(102)
§ 一点点	(104)
§ 诗宗教	(105)
§ 在感觉的世界里	
附：轻音乐片断（尹清轶）	(106)
§ 诗的回归	
附：妈妈（全遂成）	(107)
§ 复古主义：春梦了无痕	(108)
§ 被称为“歌”的言语文字作品，占春说：与诗 有关，这就够了	(110)
§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读行者《灵石不言》	(118)
§ 走向纯粹的创造	
——李金河和他的摄影作品	(121)
§ 我也乱弹一回	(124)

§ 反虚无主义的青春宣言	
——中篇小说《黑白片》阅读札记	(126)
§ 反女权主义的青春忏悔	
——中篇小说《我想有个家》阅读札记	(137)
§ 雪之声是赞美还是威胁	(145)
§ 语词国土	(148)
§ 人称代词	(150)
§ 下半年对于一种叫做丝瓜的东西的观察	(158)
§ 幸福到来之前	(161)
§ 存在的抵消	(163)
§ 不成功的作者者	(165)
§ 幸福者	(167)
§ 游戏	(169)
§ 假人	(171)
§ 附：郎毛诗选	
月光下的土堆	(173)
黄牛翻过山坡	(175)
生产红纸的工厂	(177)
如果广场上的钟再响一下	(179)
鸭毛传说	(181)
太阳底下	(183)
海上我的儿子们	(185)
后记	(186)

关于诗人之死的三重判断

当你使用诗人这个字眼时当十分谨慎。诗人不是一种职业——这种否定的表达在今天看来尽管还算不上老生常谈，但也说不上标新立异。那么诗人是什么？诗人当然不是一种职业。诗人不是经常写诗的人，甚至也不是写诗的人。当你感觉到心里在动弹——一种本真的动弹——一种由远而近，不能自制、不可理喻的动弹时，这时你说，你感受到诗了；使你感受到这种诗的，是诗人。可是你没法具体地知道谁使你感受到诗。你所知道的——时下所认为的——不是诗人，他们是诗人的模仿者，甚至——是杀害诗人的人。

这种对诗人的通常具有三重意义上的谋杀可以这样来描述。

第一重谋杀：当你把诗付诸文字时，你已毫无理由地把诗人杀害了

如前所述，诗人不是——写诗的人。诗人是诗的在者，诗的精神所在构成诗人；诗是纯粹非文化的，诗人因此是一种抽象，而不是通常的类诗的文化操作者。诗的精神并不纯粹寂寞，有时它活跃到想使每一个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感到爆炸，感到惊心动魄的震撼。而这种震撼又是微妙的，只有少

数人才能理性地感知——这就是本文意义上的写诗的人。而写诗之运作过程以及结果却不可避免地是文化。那些方方正正或者曲里拐弯的文字——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文化，文化！而这文化与诗的精神毫不相干，诗的精神恰恰是非文化！在我看来文化与非文化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并非人的全部活动都是文化。一个孩子在地上毫无目的地乱画一通，这是非文化；一个成年人（adult）也在地上乱画一通，他意识到他在乱画，于是这乱画是文化的。人在一片从未耕作过的荒野里恍然大悟，难道这悟是可以传达的吗？人的存在的全部根据就在于非文化的冲动，这冲动使人与诗有一种先天的联系。诗的精神不经意地被某些个人所感知，于是他用文化去操作这精神，他自以为是诗人，实际上诗人已被他不自觉地杀死了。作为一个无意中感知到诗的人，他并非诗的精神的在者，诗对他不是一个恒的存在，只是瞬间就过去了，他不能具有它，使它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定它正好是诗的精神的牺牲者，诗掠过他的发梢，也许真的造成一种机缘，使某种诗的精神人群化了。同时通过他的文化处理和人群的大规模文化附加，诗的精神几乎荡然无存。诗妙——但妙不可言。但大家几乎都无视这个事实，这个无视的端点就是写诗者的写诗。如果他不试图传达，说不定那诗的瞬间会哺育他一生。不幸他传达了，且以诗人自居。诗对他只是一瞬间，于是他成了诗人。诗人成了他一生的徽号。我看见过许多写过一些“诗”的人，后来他们成了什么？不，他们本来是什么？是狗屎，是一些文化的渣滓！远远就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文化的腐败味。称这么一些具体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为诗人——为纯粹的抽象的非文化的在者，这是对诗人的

第一重谋杀。

第二重谋杀：“社会诗人”的形成

但是事情远没有到此为止。如果个别写诗者还曾经感受过诗的精神，那么一大批“诗人”的涌现则使诗遭受灭顶之灾。不知道为什么造物主会让人犯这么大的错误，他们对自己的无知与对诗的强加同样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随便打开那些自称诗刊、诗歌报的次文化小柴门，一眼可以看见那么多文字排列。这些排列显然出于一种处心积虑的预谋，但无论如何你不容易找到关于诗的迹象。功利主义的人格构成，假哭假闹的文化情感，以及变着法儿讨好的种种媚态……我不以为举例可以证明任何判断，因为相反的例子又可以证明相反的判断。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从这些柴门里挑出个别关于诗的句子，这些句子的品格可以属于第一重判断的范围。但这并不能影响对这些次文化现象的总体评价。我仍然要说，诗的精神在这里遭到大规模洗劫，可恶的是，这洗劫正是在诗的名义下公开进行的。

从这里，从各个自称诗歌版面的纸上涌现出一大批“社会诗人”。所以称他们为“社会诗人”当然是出于行文的需要，因为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字眼来指称这些充分社会化、功利化、庸俗化的写诗者的模仿者，他们比写诗者更低一级，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诗，从来不知诗为何物，却在经年累月、成千上万地模仿、排列和炮制，毫不汗颜地享受人群所给予诗人的殊荣，他们对诗的糟踏已形成强大的心理定势，似乎不把诗糟踏成垃圾便死不瞑目。这是一些与真正的

诗歌精神无关的人。因为没有天分，他们听不到任何关于诗的声音。“但我们是诗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由于文字对诗的附加已被当然地认可，由于诗歌判断力的普遍匮乏，某些特殊的文化圈层以及专门编辑文字的人便可以轻易地把诗人的桂冠分送给任何立志糟踏诗的人们。于是有了以“诗”为职业的“社会诗人”的出现，多少人对诗的真诚的期待，多少人对诗的良好知觉，都被残酷地杀死。

第三重谋杀：“新诗潮”带来了什么

所谓“新诗潮”的出现，并不是诗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诗既然是自在的，那么它既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未来。它既然是新鲜的，那么它也总是运动的，恒一的。所谓“新诗潮”不过是相对于左翼文化运动以来公众诗歌意识的偏狭、萎败而言，在观念、技巧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它仍然在承载观念，只不过是变化了的观念，而技巧方面的更动，除了使写诗者对诗的感受复杂化以外，并没有给诗的命运带来真正戏剧性的改观。诗仍然被认为是技巧的，情感的，文化的，人们对诗的理解仍没进入诗本身。我所看到的景观仍然是：文化操作了人，人又以文化操作着诗；诗的非文化精神跑得远远的，在人们眼前展开的仍然是文化的文字，而不是诗！诗的仓皇的灵魂仍在飘零。同时，廉价的情感泛滥和技巧化的趋势必然带来人们对诗的纯粹感受的衰退，造成对诗的新世俗的附加，造成人们对诗的取巧心理的生成。时下流行的各种“诗歌大展”、“诗歌大奖赛”正是这种心理的产物。难道诗是鞋子、是性病吗？怎么可以展

览？我常常想，这些次写诗的、次编诗的与其如此苦心经营，企图以诗的名义达到世俗的功利的目标，与其把诗折腾成这个样子仍不能达到目的，他们为什么不去偷，不去抢？后者反而诚实些。我看这些“诗”的展览如传染病一样到处蔓延：全国的，省的，“流派”的，地域的，东部的，西部的，地方的，县的……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常常在心里为诗而哭泣，这是在现代条件下，以商业形式对诗歌精神所进行的持续性亵渎。几年过去了，从所谓的流派大展的后果来看，它实际上遏止了真正的具有诗歌品格的流派的成长，使许多假冒的没有任何生命力可言的东西扶摇而上，任何对这些展览有所印象的人都忘不了其中充斥着的浅薄、庸俗、大言不惭——简直就是一次假冒产品之集大成！我没法弄明白是什么样的人格结构使他们如此热衷于经营这样的活动。这不大不小的恶作剧一如滑稽的杂耍，它只会使公众诗歌意识更加恶劣，只能暴露出主持者的浮躁和扭曲。

写作者的起哄派一哄而起，编辑界的搅和派推波助澜，这就构成所谓中国诗歌现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悲凉：那被无数次向往无数次期待的诗人，那代表着人类生命冲动和博大宁静的诗人——那非文化精神的在者——哪里去了？

我要非常现实地告诉你：他死了。

跋：寻找真正的诗人

当我将要完成这篇文章时，我发觉我显然已不可避免地走入逻辑的死胡同：如果诗人真是那微妙的冲动的非文化精

神的在者，那么以上种种次文化圈子里对诗人的望尘莫及的次文化附加以及小打小闹——真的能构成对诗人、对诗歌精神的伤害吗？诗人如果是抽象的，那么诗人能够被杀死吗？回答当然不是肯定的。可以这么说：以上种种公众诗歌状况和纯粹诗歌是无缘的。恶劣、蒙昧的公众诗歌状况当然有助于生长恶劣蒙昧的公众诗歌意识，这种公众诗歌意识从很大程度上窒塞了人们接近诗歌的机会，扼杀了人们对真正的诗人的期待。这样，那个本来的诗人在世界上似乎不见了，被那些模仿者——那一代代写诗的人杀害了；但同时，这种公众诗歌意识永远是此在的，而不是本在的，因此它对那本在的恒在的诗歌精神永远不可能有所影响，有所污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相反的判断：诗人——这诗歌的在者是常青的，它永远不可能为世俗所杀！

既然社会和人群不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诗人，既然诗人只是一个抽象的、纯粹的存在，那么这存在当和你有关。是的，你没写诗，但你感受了，任何诗潮也没法取代和覆盖你对诗的基本的直觉的感受，在那一瞬间你充分感受了它。妙就妙在你没有试图传达，你没有用文化去附加这自在——这是你从过程到结果与写诗者与“社会诗人”的区别。在这大智的实现中，你接近了你的个体因。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在你之外，去期待诗人呢？诗人——他既然曾经在你的深处，那么，他还会到来！